暖 心

叫醒你的小耳朵

“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训练。 李羽珩/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实习生 杨清清 王鹏翔

每个周六，在天津市河西区文化馆三楼，常常能邂逅不少“明星”。

国家一级作曲家张如昕、天津歌舞剧院中提琴演奏家杨小双等，都是这里的常客。连续6年多来，他们坚持做的事情，就是带着一群有着听力障碍的孩子，唱出动听的旋律。他们要对着无声世界描绘美好。

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一一支听障儿童合唱团。起名‘小海豚’时，获得了家长的一致认可，他们期待着孩子能练就海豚一样灵敏的听力、活泼的性格，还有聪明的头脑。

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小海豚”合唱团面对的是最不可能的群体——听力障碍者。起初，连一些家长都不相信：“孩子连话都听不清，还能唱歌？”

直到这群‘小海豚’们屡屡登上国内外大小舞台放歌，依旧有人怀疑其真实性。在被视为‘合唱界的奥林匹克’的世界合唱比赛赛前，评审会外国专家组曾专程到天津考察，观看了孩子们和志愿者的日常训练后，他们流着泪直呼‘了不起！’

就这样，“小海豚”们与全世界顶尖的儿童合唱团同台歌唱，一次又一次捧回世界级大奖。

“小海豚”的天籁之音让许多人动容。瑞典著名合唱指挥家弗雷德·勋伯格、中国著名交响乐指挥家郑小瑛都曾先后来看望他们，陪他们唱歌。

这些平均年龄不足10岁的听障孩子，用难度很高的《D大调声乐协奏曲》等歌曲征服了指挥家‘挑剔’的耳朵。郑小瑛说，“孩子们的歌声让我震撼，志愿者老师们的精神更使我钦佩。”她把这看作是‘创造历史’的事业。

不久前，“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志愿服务项目获评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妈妈，我想和别人一样”

普通人也许永远也无法对听障人的世界感同身受。

眼下最先进的人工耳蜗技术，用科技尽可能逼真地模拟人耳声场，来唤醒那些“睡着”的耳朵。然而对植入人工耳蜗后的真实感受，人们有各种不同的描述，有人听到了大量的回音和嘈杂声，有人形容像是把头埋在游泳池里听到岸上的声响。

肖玲很清楚听障人的苦恼，她是天津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中心的一名教师。似乎是命运跟她开了一个玩笑，教了8年聋儿，她自己的儿子承承出生后也被诊断为先天听力障碍。

当时孩子刚出生不久，一天晚上，她和孩子在家睡觉，突然一辆大车从窗前经过，发出的巨响一下子把肖玲惊醒了，可一旁的孩子却始终睡得很香。多年的职业经历让肖玲心头一紧，她带孩子去医院做了测试，结果显示为极重度耳聋；“也就是说，飞机在身边起飞，他都听不见。”

顾不得悲伤，甚至连流泪的工夫都没有，专业知识告诉肖玲，必须尽快找到最适合孩子的人工耳蜗；“越早开始训练越好！”在此之前，很多听障人因为没有采用或太晚使用人工耳蜗，始终只能通过手语与外界交流，很难融入正常人的世界。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承承一周岁时植入了人工耳蜗，这是当时全国年龄最小的人工耳蜗使用者。

孩子第一次通过人工耳蜗听到世界的表情让肖玲印象深刻；“别的孩子在哭，但他没有。他瞪大了眼睛，伸手指着我，一副特别惊讶的样子。”

等待承承的是可能长达一生的漫长训练，这比植入人工耳蜗本身更为重要。肖玲带着孩子训练，鼓励他像普通孩子一样快乐地读书、玩耍。

四年级时，承承的小学举行大合唱，唯独不让他上场，因为他唱不准音，甚至被告知；“你睡觉都行，就是别出声！”孩子伤心地问妈妈；“我还是和别人不一样，对吗？”

这是每个听障儿童的家长都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很多听障儿童往往一开始进入了普通学校，但最终还是因为融入困难，不得不重返聋哑学校。

肖玲冒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教听障孩子唱歌。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国家一级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张如昕，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为这些特别的孩子建一个合唱团。张如昕亲自为孩子们谱曲，同时邀请来多位艺术家志愿者。

就这样，2014年11月8日，“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成立了，承承是第一个成员。4位艺术志愿者，带着8个听障小朋友，开启了用音乐唤醒精彩人生的寻梦之旅。

“遇见这些孩子，是我的幸运”

“喂喂喂，你听到了吗？喂喂喂，你看着我，我要为你唱首歌，叫醒你的小耳朵。嗨嗨嗨，我听到了，刚才耳朵睡着了……”这首《叫醒你的小耳朵》是张如昕送给孩子们的歌，这位音乐家把自己对孩子们的爱，全写进了歌里，脍炙人口的还有《你行，我也行》《小鲤鱼跳龙门》《小海豚游世界》等。

他熟悉合唱团里的每个孩子，孩子们爱他、敬他，人人都喊他‘姥爷’。

“姥爷”每周六都会早早来到河西文化馆陪孩子们练歌，他决心“要把这个团带成世界上最好的团”。这位知名作曲家创作的许多作品曾在全国和世界级比赛中屡获殊荣，他寻找着各种机会把孩子们带到更高更大的舞台；“想让他们看看更大的世界。”

建团初期，没有固定排练场地，志愿者们只能带着孩子们四处‘打游击’。听说‘小海豚’的故事，河西区文化馆给他们安了家，副馆长李孝辉特意为孩子们留出3间音乐教室，保证‘小海豚’们的学习和训练。

没人能清楚地描述，让这些天生失去听力的孩子学会唱歌，到底有多难。志愿者汤小娟是天津市西青区文化馆的副馆长，这些年来，她一直是‘小海豚’们的声乐老师和音乐表演老师。

如何跟丧失听力的孩子讲音准，这对志愿者老师是极大的考验。她们必须用上一切可以使用的办法，传统的音乐教学的方法失灵了，不得不使用各种肢体语言来帮助孩子们理解。比如，用手势高低来描述音高；为了表达情绪变化，需要时而跳起来，时而趴到地上。

几个不同轻重的‘do’，通过人工耳蜗传递到孩子耳朵里的可能听不出区别。汤小娟就一个一个摸着孩子的肚子，教他们呼吸，让他们明白用力到哪块肌肉才恰到好处；“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遍遍地磨。”汤小娟说；“正常孩子可能2次就学会了，那我讲100次，他总能理解吧？”

有时候为了教会一个音节，杨小双可能要付出半年的努力，不停地纠正他们的发音。在她眼中，就没有教不会的孩子。

每周一次的集中训练，对‘小海豚’而言远远不够。志愿者们把孩子们分成小组，每天晚上固定通过手机陪每一个孩子练习。

每到这时候，汤小娟总会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逐一跟孩子们交流；“外面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管。”这曾引起女儿的抱怨。当时女儿正在准备高考，学习压力很大，放学回家希望跟妈妈说说话，可妈妈的时间总被那些孩子占据。

直到有一天，汤小娟戴着一副新买的耳麦边听边哼唱，一旁的女儿惊呼道；“妈妈，你唱歌怎么会走调了呢？”在女儿印象中，学作曲的妈妈一直有着极好的乐感。汤小娟笑着回答；“这耳机太好了，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就找不到音了。”

女儿当时就哭了，她终于理解妈妈一直陪伴的那些听不见的孩子，面对世界的难。考上大学后，擅长弹钢琴的女儿跟着妈妈一起来当志愿者，给合唱团的孩子们伴奏。

而汤小娟总觉得，这些年陪伴小海豚的日子里，自己收获的爱远比付出得多。她记得自己有一次发着烧依旧开车跨越天津市好几个区来给孩子们上课，并努力不把疲态表现出来。一节课下来，一个孩子走到她跟前摸了摸她的额头问；“老师，你还在发烧吗？”

汤小娟相信，命运夺去了这些孩子们的听力，也给了他们比常人更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他们总是很快乐，说话的声音也大，仿佛快乐也被他们放大了。”

有的孩子会在每天睡前给杨小双发去一段自己唱的歌，想把自己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也送给老师。

有人感慨，这些听障儿童遇见你们真幸运啊！张如昕会立刻纠正；“遇见他们，才是我们的幸运！”

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一个方向

科学至今无法解释，新新（化名）为什么天生就听不见声音。

“小海豚”合唱团里，这样的孩子很多，也有的父母就是聋人。新新的妈妈是大学老师，她发现女儿植入人工耳蜗之后，依旧说话声音特别小、胆怯，不敢和别人交流，“除了跟爸爸妈妈说话，面对其他人都是低着头。”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新新被送来‘小海豚’合唱团，3年过去了，妈妈看到女儿身上发生的变化；“她现在嗓门很大，在学校里跟同学们交流也非常开朗。”

小学二年级期末，学校老师在给新新的评语中写道；“同学们都愿意跟你接触，你总是能够和所有同学谈笑风生。”这让新新妈妈感到特别高兴；“她成绩也不错，但我更看重她的性格养成。”妈妈认为，女儿的阳光开朗跟学唱歌、多次登上舞台演出有很大的关系。

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合唱获奖并不是这些孩子们努力的尽头，而是用音乐打开人生的方式。建团之初；“小海豚”合唱团就定下方向——科学康复、艺术陶冶、改变性格、扭转命运。

“首先要让孩子们有自信。”姥爷”总给他们讲，人人有弱点，你们自己要坚强起来，要不断地学习，把弱点变成强力。

“第二步，要改变妈妈。”张如昕说；“姥爷的称呼都是孩子们随着妈妈叫的，因为陪孩子来唱歌的，绝大部分都是妈妈。”

有的人住在天津的偏远区县，每周六一早5点多就起床，妈妈带着孩子辗转坐几个小时公交车，只为及时赶到‘小海豚’合唱团训练。

植入人工耳蜗和后期训练需要高额费用，压得一些家庭喘不过气来，有不少夫妻因此离异，只剩妈妈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

生活的难题一股脑抛来，有的妈妈变得脾气暴躁，很多人无心打扮自己，情绪也很低落。志愿者们认为，妈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和陪伴者；“要让孩子坚强，妈妈首先要强。”她们为这些孩子的妈妈专门成立了合唱团，从乐理开始一点点教会妈妈唱歌，教她们打扮自己，找回自信和快乐。

张如昕希望能把志愿者、妈妈和孩子的努力拧成一股力量，帮助孩子们跳过听障这道‘龙门’；“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人只要努力，都有一个方向。我们要做一个创造者，而不是一个被施舍者。”

6年来，“小海豚”合唱团从最初的8名团员发展到42名，志愿者从4名发展到46名，志愿者中有专业院团的作曲家、演奏家、舞蹈家、戏曲表演艺术家，还有医生、大学教师、记者、企事业干部、大学生等。在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小海豚”们从最简单的曲调开始，直到学会了复杂的合唱，从歌曲又接触了戏曲、曲艺、音乐剧、话剧等形式多样的艺术形式。而多年来，志愿者们始终默默付出，连一瓶水一盒饭都未曾索要过。

从全国残运会开幕式到国际各种合唱比赛捧杯；“小海豚”们从天津唱响中国，震撼了世界。“小海豚”与多个交响乐团和著名指挥家合作，在不同的舞台上呼唤人们关注听障群体；他们到学校、医院、企业、消防队等举行公益演出；他们把在国外参加合唱比赛期间的义演收入捐给听障儿童学校；他们唱着“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告诉全世界‘你行，我也行’。

“我是海豚嗨嗨嗨，一双耳朵最厉害，它能听见水草笑，它能知道鲨鱼来……”

有人用泰戈尔的诗句赞美这群小天使——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扫一扫 看视频

图片新闻

9月4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甲依乡拉木觉村，彝族妇人曲么木土火准备去喂鸡和猪。她的故乡在四川大凉山腹地，夫家所在的拉木觉村至今仍是凉山州尚未退出贫困序列的最后300个村之一。今年6月，她和家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进了新居。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跨越『小慢车』边境

黎 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57岁的戴洪强在5511/2次列车上工作已有15年。1953年，南凭线开通运营，跟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脚步，火车通了，这趟从南宁开往凭祥的‘小慢车’便在铁轨上日复一日地行驶了67年。

5511/2次列车是中越边关唯一的一趟“小慢车”，经过崇左、凭祥抵达中越友谊关，并与越南铁路相接通往东南亚。这趟拥有8节硬座车厢的列车，平均时速为40km/h。对于沿线8个站周边的居民来说，这趟车是致富车、探亲车，也是学生的求学车。而平均每站不到4元的票价，显得特别“接地气”。

跟着列车长戴洪强的脚步，记者看到车厢里一派热闹的景象：老乡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唠家常，座位旁的担子里放着土鸡蛋、菠萝蜜、火龙果和芭蕉等农产品，以及越南咖啡、牛角梳等外贸商品。

“我家今年的火龙果、芭蕉一起收了1000多斤，之前我还担心会受疫情影响没有销路，烂在地里，没想到政府联系了商家来收，不仅没亏，还挣了不少钱。”

“今年我们开了直播，水果都卖到北京去了。”车厢内，几个当地的水果种植户你一言我一语，笑声随着火车的哐当声飘向窗外。

“凭祥是中越边境线上最大的边贸点，很多做边贸生意的人都是坐这趟车。”戴洪强说，10多年前，每逢沿线村镇有集市，大家便挑着大筐小筐，搭着火车去赶集。老乡们坐车出去的时候带着自家的农产品，返程的时候带点越南特产，这样来回都不会空手，还能挣点差价钱。在车厢内，青菜瓜果、鸡鸭鱼肉挤得满满当当。

如今，随着出行方式的变化，平常坐这趟慢火车的人减少了很多，但一到节假日，一些忠实“粉丝”还是会搭乘这趟车，车上又会恢复往日的热闹。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多趟火车停运，汽车不运营，这趟“小慢车”就成了山里百姓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旅客潘女士每周都要搭乘这趟车往返于凭祥和渠旧之间。她到凭祥进些越南的白虎活络膏、牛角梳、咖啡等特色商品，带到渠旧售卖。她每次都会进1万元左右的货，以前靠火车把货拉回家里。现在物流发达了，便通过物流托运到渠旧，这些年生活越来越好，家里还盖了新房子。

“多亏这趟车，我才能做外贸生意，供孩子读书，住上新房，养活一家人。”潘女士说。

今年春运期间，坐车的人很少，但5511/2次列车依然照常运营，车上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措施做好车厢消毒、测量体温和人员登记，确保每一位居民的安全。

沿途小站的学生，都乘坐这趟列车到崇左读高中。“我每周都坐这趟火车回家，票价便宜、安全、舒适，有事找乘务员叔叔阿姨帮忙解决，爸妈也放心。”学生韦强说。

旅客周蕊，小时候常常坐这趟车去外婆家，后来她考上北京的大学，也是通过这趟车到南宁转乘去北京的火车。这趟车虽然速度慢，设施也比不上动车高铁，但确实给学生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凭祥地处边陲，有许多盲人旅客会乘坐这趟车到南宁工作。“他们都知道我们有提前引导的服务，在车上，我们还会帮助他们打水、搀扶他们上厕所。”戴洪强说，车上的工作人员都遇到过盲人旅客，有时遇到他们赶车没来得及吃早餐，工作人员还会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

60岁的李润清，自打她记事起，就经常跟随父母乘坐这趟车前往宁明的老家。当时物质比较匮乏，能坐火车出远门已是一个孩童最开心的记忆。在她的记忆中，这趟车的设施设备几乎都变了，但唯一不变的，是铁路工作人员的热心服务。

“无论社会发展的多迅速，总存在着一些弱势群体、中低收入人群，慢火车也始终有它存在的价值。坐车的老人多，我们都把他们当自家老人一样，我也快退休了，还真舍不得这些老朋友。”戴洪强说。

出生缺陷防控，不得不走的‘扎心之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在门诊偶遇一个只有一岁半孩子的时候，王瑞红停下来，鼻子抽动几下，就说：“这孩子肯定有问题。赶紧去做检查”。

果然，孩子被确诊为苯丙酮尿症，这是一种先天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孩子出生后如不能及时确诊并进行饮食疗法，身体和精神发育就会迟缓，还会有攻击性，也会伤害自己。

“您是活神仙吗？”孩子的妈妈很感激她。

王瑞红说：“我不是活神仙，得苯丙酮尿症的孩子身上有一种老鼠尿味道，很特别。”

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了32年，王瑞红仍是医学遗传科一名普通的检验技师，但很多患者都把她看成‘活神仙’。天乐（化名）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位大恩人。

几年前，王瑞红跟随在同院工作的丈夫齐书武，下乡为一名患儿做手术。在和病人家属聊天的过程中，王瑞红得知患儿的表姐十几岁仍没有来月经、胸部发育完全没有女性特征，她敏锐地判断，女孩的性别发育可能有问题。

王瑞红主动问，能否为孩子进行一个简单检查。女孩的妈妈天乐听说后，赶紧把孩子带到王瑞红面前。

经过检查，尽管孩子的生殖器表现是女性，但王瑞红初步判断孩子得的是完全性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染色体性别可能是男性，这是一种X连锁隐性遗传病，隐藏在腹腔内的睾丸有可能引发恶性肿瘤，需要切除后予以雌激素替代治疗。

王瑞红觉得有点‘扎心’，她把电话留给了天乐，千叮咛万嘱咐：“不用害怕，有办法的，我爱人治疗过很多这样的病例，一定带着孩子到省第一人民医院来检查，我帮孩子化验确定病因。”

王瑞红的出现，对天乐来说如同黑色天幕中的一束光。一下长途汽车，她就打电话给这位只见过一面的王医生，没有想到王医生特别热情，如何换车，如何挂号，一路电话不停，随时贴心指导。

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的性染色体是男性。但是孩子一直被当做女孩养育，皮肤也很白皙，对于自己的性心理认同也是女孩。在和孩子以及天乐商量后，齐书武医生对异位的睾丸进行了手术切除，由于孩子没有子宫，将来不能生育，王瑞红安慰孩子：“这是上天给予你的一份特殊的人生礼物，妈妈为了你很不容易，为了妈妈，好好生活下去！”

“天乐女儿的性别问题，如果在怀孕期间进行必要的基因检查，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王瑞红在日常工作中，敏锐而热情，所做工作常常超过自己的职责范畴。

发现那个确诊为苯丙酮尿症的孩子时，孩子的妈妈已经再次怀孕，王瑞红坚持，胎儿必须做染色体检查。经过化验，发现胎儿还有这种遗传病。她很同情这个母亲的遭遇，但从家庭负担的角度考量，还是建议把孩子引产。

这些年，王瑞红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时刻，筛查出的胎儿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时，“建议引产”四个字说出来，心里多少有一点同情。

2020年3月2日，医院医学遗传科主任朱宝生对王瑞红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国家相关部门正式对外发布了新职业，你会有一个新的身份：出生缺陷防控咨询师，这意味着你也有了职业晋升的通道，好好努力吧！”那一刻，王瑞红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王瑞红工作32年，没有‘官位’，高级职称也没评上。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涉及的学科主要是医学遗传学，然而，检验技师晋升职称考的是常规临床检验工作，天天做细胞遗传学工作的人很难考取。

“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我热爱这份工作。”王瑞红说。

朱宝生主任目前是国内出生缺陷与罕见病临床医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博士生导师。

1991年，朱宝生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医院计划生育科细胞遗传室工作，从事细胞学检查、遗传咨询和生殖健康服务。正是在朱宝生的带领下，王瑞红逐渐认识到细胞遗传学检查的重要性，把出生缺陷防控当成了自己毕生的方向。

云南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的出生缺陷防控工作任重道远。有很多夫妻辗转全国知名大医院就诊后又回到云南，最后在医院精准的检测和咨询建议的帮助下，生育了健康的二孩、三孩。

“出生缺陷防控工作的重点，不是在医院的诊室里，更重要的是在偏远的乡下。”王瑞红说。

一起工作29年，朱宝生和王瑞红足迹遍及云南。除了怒江州路太远没有去过以外，其他地级市和自治州几乎走遍。王瑞红每年都要下乡10多次，免费为基层医生、技师、护士培训出生缺陷防控知识。

“她有一个旅行箱，长期放在家中，里面装着出差需要的个人洗漱用品、衣服，可以随时拎包就出发。”在齐书武眼中，王瑞红就像一个战士，随时准备‘战斗’。

下乡做出生缺陷防控工作，常常是一场‘扎心之旅’，但必须要走。

几年前，在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的一家卫生院，王瑞红和朱宝生教授见到一位怀孕的佤族妇女，她21岁，带着一个4岁左右发育迟缓的孩子。孩子躺在垫子上休息，身上很脏，有苍蝇过来叮，他也不知道用手赶一下，看起来傻傻的。

孕妇很抗拒做检验；“你们就是想搞计划生育。弄掉我的孩子。”她一脸戒备，眸子里都是惊恐的表情。

王瑞红感到揪心，根据经验，如果老大有问题，说明这对父母的染色体很可能有问题，再生下来的孩子有可能还‘不好’。她尽量用和蔼的态度打消孕妇的敌意；“先检查一下，看看胎儿如何，你不用害怕。”

孕妇终于同意做B超，结果发现胎儿畸形。她通过当地医生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告诉孕妇：“孩子有问题，不能生，生下来也很难养活，家里原本贫困的生活会雪上加霜。”

孕妇孕前没有进行检查，怀孕后缺乏营养，但是她不愿意检查，更不愿意引产。听了王瑞红的建议后，孕妇打了引产针，引产下来的胎儿内脏膨出，几乎没有骨头，完全是畸形。

在云南省，王瑞红所在医院所承担的遗传病防控收效显著，仅2018年，经过他们排查确诊的致死性疾病和严重致残胎儿共引产399个，占全省当年活产的婴儿总数的0.63‰，客观上提高了全省的优生优育水平。

“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一群人，只为守候健康的孩子出生。我十几年来没有换过手机，晚上睡觉也不关机，我的手机号码就是一条出生缺陷防控的热线。”王瑞红说，有时在家，饭吃到一半，州里县里的医生或者病人的电话打了过来，自己连忙离开餐桌去接听，常常是电话说完，饭菜已凉。

王瑞红清楚地记得，在云南省广南县有一个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家里是贫困户，生活很困难。几年前，这家人带着孩子来到昆明到科里问诊，寻求孩子治疗方案。几年后，得知这户女主人再次怀孕，朱宝生借着到文山出诊的机会，主动上门帮助孕妇做检查分析，同时，还带着全科同事的几千元捐款到家里探望患病的孩子。

“经过产前诊断，这次怀孕，胎儿的基因没有问题。当我打电话告诉这家人时，孩子的父亲显得特别激动，也特别感激。”王瑞红说。

9月17日，王瑞红再出发。她和医院同事一行到临沧市临翔区妇幼计生中心儿童康复中心为出生缺陷儿童体检，康复中心里有十五六个孩子，有的是脑瘫，有的是唐氏综合征，还有别的先天性遗传病，孩子们大多表现为智力低下，完全不能与人正常交流。她看到家长们无助的眼神，又一次被‘扎心’了。

王瑞红外出看病很少拍照片，这次，有同事用手机帮她拍了一些工作照。回到家，姐姐看到照片里的事实，难过得直哭，感慨道：“我们真是太幸运了，感谢老天的眷顾，我们的孩子都是好好的。”王瑞红说：“其实，在怀孕的过程中完全可以科学地筛选胎儿的好坏，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很多偏远地区的人没有这个意识，出生缺陷防控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扫一扫 看视频